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朱万曙 卞利/主编

戏曲·民俗·徽文化 论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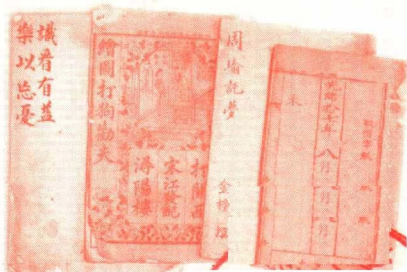


XIQU · MINSU · HUIWENHUA LUNJI

安徽大学出版社

● 朱万曙 卞利/主编

戏曲·民俗·徽文化 论 集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戏曲·民俗·徽文化论集/朱万曙,
卞利主编.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12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ISBN 7-81052-952-8

I. 戏... II. ①朱... ②卞... III. 文化—徽州地区
—国际学术会议—论集 IV. K295.4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27240号

戏曲·民俗·徽文化论集

朱万曙 卞利 主编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经 销	新华书店
联系电话	编辑部 0551-5108241 发行部 0551-5107784	印 刷	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电子信箱	ahdxchps@mail.hf.ah.cn	开 本	850×1168 1/32
责任编辑	木 子	印 张	19.25
装帧设计	孟献辉	字 数	465.7千
		版 次	2004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1052-952-8/K·70

定价 30.80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出版说明

1999年12月,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被列入国家教育部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心确立的发展战略:第一步是搜集和整理徽州的历史文献资料,为徽学作为新兴学科的发展打下坚实的资料基础;第二步的工作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徽学进行分门别类的深入系统的研究,写出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著。目前,第一步的工作已经有效展开,《徽州文献综录》、《徽州文化遗存的调查与研究》和《新发现的徽州文书的整理》等重大项目陆续完成并出版了部分成果。第二步的工作也已经开展,出版《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学术丛书》就是具体举措之一。

本丛书坚持学术质量至上的原则。不限种数,凡是以徽学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和论文集均可列入。按照程序,先由作者提供书稿,中心邀请专家评审,达到出版的学术水平,即可列入丛书予以出版,出版经费由中心筹集。这是解决学术著作出版困难、特别是推动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举措。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学术丛书》这一命名,是根据国家教育部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要求决定的。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明确要求,

重点研究基地的人员是流动的,实行“带课题进所,完成课题离所”的动态机制。因此,丛书作者的人事关系不一定在中心,但只要被中心聘任为专、兼职研究人员,其研究著作均可列入本丛书。

学术乃天下公器。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依托于安徽大学,在学术上却面向国内外学术界。中心愿意为从事徽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们提供一个成果出版的途径;同时,也通过这一途径有力地推动徽学的学术事业,希望得到学术界和社会各方面的支持。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二〇〇四年九月

前言

2003年2月7日至12日,当全国各地还沉浸在浓郁的羊年春节气氛中,“戏曲·民俗·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安徽池州市和黄山市两地召开了。此次会议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与中国傩戏学研究会、池州市人民政府、黄山市文化局联合主办,安徽省艺术研究所、黄山学院、池州师范专科学校协办。参加会议的代表除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者外,还有来自日本、韩国、加拿大以及香港、台湾的朋友,共90余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教育电视台的记者也纷纷前来采访,予以报道。

会议分为池州与黄山两段举行,学术研讨与田野考察相结合是本次会议的重要特点。2月7日,在池州举行了开幕式,并进行了一整天的学术交流;8日,会议组织代表们考察了丘村柯的傩戏、傩仪演出,晚上还观看了池州市文工团的傩戏演出。2月10日,会议组织代表们考察了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和渔梁街的歌舞;11日,前往祁门县历溪村考察了目连戏的演出活动;12日,又举行了一整天的学术研讨活动。由于得到各举办单位的大力支持,本次会议内容饱满,结合会议主题进行的学术考察,使代表们感到收获颇丰富。

徽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戏曲、民俗是其中的两个层面。通过对戏曲、民俗的研究,不仅可以更深入地认识徽文化的丰富内涵,也可以深化对地域戏曲和民俗的研究,它们就像三棱镜一样,互相映照,其立体的文化貌像更为清晰。此次会议召开之际,“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研究和抢救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会议也起到了呼应作用,其影响是积极而长远的。

围绕着会议主题,大部分代表都提交了论文,共59篇,按内容可分为四个部分:一是戏曲文化与徽州,二是池州雉文化,三是徽州及皖南地区的民俗文化,四是中华文化视野下的戏曲、民俗和雉文化。有的论文侧重于文本研究,有的论文侧重于田野调查,它们都蕴涵着丰富的信息,闪耀着真知灼见,是对徽文化的新的拓展,也是本次会议的最重要的学术收获。我们从提交会议的论文中选取了43篇,予以结集出版。少部分论文或因为论题和会议主题结合不紧密,或者只是提纲,只好舍弃。另外,还有部分与会代表在会议上发表了精彩的见解,但未能形诸文字,而论文集出版时间也不能拖得太久,也就不再等待了。

相信本论文集的出版,为从事徽文化、戏曲、民俗等领域研究的学者都会提供有益的信息和启迪。对于编辑方面可能存在的疏误,也敬请读者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

目 录

前 言 (1)

刘文峰	徽商与西商之比较及对戏曲的贡献 (1)
郑志良	明代徽商与昆曲的兴盛 (32)
么书仪	徽班给北京带来了什么 (47)
曹 琳	徽剧东渐与里河乡班的祭台敬神 (73)
邓翔云	浅谈徽文化和目连戏的“变” (82)
王日根	徽州会馆与徽州戏的播扬 (94)
郭英德	“徽池雅调”剧目述考(提纲) (102)
朱万曙	明清两代徽州的演剧活动及其与区域文 化的互动关系 (113)
徐子方	程士廉和他的《小雅四纪》 (144)
鲁安娜	谈方成培的《雷峰塔传奇》 (150)
河灵心	潘之恒表演论之特殊性 (160)
陈 琪	祁门县马山村目连戏班初探 (178)
章望南	传统民间戏曲与徽派建筑装饰 (191)
俞为民	青阳腔与俚歌北曲的融合 (206)
潘华云	明代青阳腔剧目初探 (222)
王 平	刘城和他的四首“观雉诗” (230)

王秋贵	傩戏三型辨	(240)
吕光群	远古遗响	
	——傩文化中的生殖崇拜	(257)
何家荣	大宇坑风情札记	(267)
周显宝	傩戏、青阳腔与祭祀仪式的缘生形态	
		(276)
周青青	林珊珊 近二十年我国傩戏研究综述	(298)
卞利	徽州的民间信仰述论	(316)
吴兆民	从民间歌谣看徽州人的观念世界	(341)
王振忠	俞樾眼中的徽州风俗	(359)
陈长文	张学文 戴光照	
	绩溪县扬溪镇傩舞《破寒酸》	(379)
朱恒夫	皖南抄本《泄天机》的文化价值	(395)
毕民智	歙县年俗述略	(406)
孙承平	歙县南乡婚嫁民俗与撒帐歌	(415)
倪国华	徽州民间祭祀歌舞	(428)
星野纮	“迎接奇形怪状人”民俗与戏曲发展的	
	关系	(444)
王冬兰	中国羌族传承小戏“讨口子夫妻”	(449)
巫允明	试说安徽花鼓灯与陕北秧歌之关系	(457)
朱小田	近世庙会戏文与乡土社群教化	
	——在江南民间戏文的整体场景下考察	(466)
赵山林	戏曲活动与戏曲民俗的生动记录	
	——皖籍作家竹枝词研究之一	(488)
高翔	中原民俗戏剧初探	(498)
邢莉	蒙古草原的傩文化	(508)
白秀芹	亦庄亦娱祭祀剧	(520)

汪晓云	民间狂欢仪式:黄梅戏的相对原生态 (530)
纪永贵	槐荫树探源 (545)
吉川良和	关于《佛说目连救母经》及《目连救母出 离地狱生天宝卷》的成书年代 (554)
李连生	诺皋、傩戏与诗赞体戏曲 (569)
丘慧莹	民间剧与文人剧的差异 ——以元杂剧《桃花女》故事为例 (582)

●刘文峰

中国艺术研究院

徽商与西商之比较及对 戏曲的贡献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股商人势力特别瞩目,一是徽州商人,简称徽商;一是山西、陕西商人,俗称山陕商人,简称西商。从明中叶至清末,这两股商人势力遍布全国,控制中国经济命脉达300多年之久,对各地的经济、文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西商产生于黄河流域,徽商产生于长江流域。两地的商人既有各自的特点,又有许多相近的地方。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对徽商、西商分别进行过比较深入、细致的研究,但将二者比较研究还不多见。本文试将徽商与西商的异同作一些比较,并就徽商和西商对戏曲的贡献谈一点看法。

一、徽商与西商之共同之处

1. 生存条件相似

徽州在长江以南,山西和陕西在黄河东西,两地相隔千里,气候、地理有很大的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人多地少,物产匮乏。《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二十》称:“徽郡保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塿,所产至薄……不宜稻粱。壮夫健牛……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又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什九。

……田少而直昂，又生齿日益，庐舍坟墓不毛之地日多。山峭水激，滨河被冲啮者，即废为沙碛，不复成田。以故中家而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山高水激，不利于农业生产，粮食奇缺，劳动力过剩，成为徽商产生的自然根源。南宋淳熙《新安志》记载，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卢坦出任宣歙观察使，正值旱灾，“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辐辏，民赖以生”。由此可见，最早的徽商是靠贩运粮食起家的。

山西和陕西在历史上也是人多地少，特别是黄土高原、秦岭、太行山区，生态环境差，非常不利于农业生产。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四谓：“河以北为山西，古冀都邑地，故《禹贡》不言贡。自昔饶林竹、繻、旄、玉石，今有鱼、盐、枣、柿之利。所辖四郡，以太原为省会，而平阳为富饶。大同、潞安，倚边寒薄，地狭人稠，俗尚勤俭，然多玩好事末，独蒲坂一州富庶尤甚，商贾争趋。”山西东部为太行山脉，西部为吕梁山脉，耕地少，气候干燥，不利于农业生产，但有丰富的矿藏资源，煤、铁、盐等均居各省前列，有利于发展工商业。加之“明季以来，漳水上流时虞泛滥，而御河亦不便递运。如是行旅之往来，多取道于山西平定州。其由西南来者，率自河入汾，由西北来者，或由河入汾，或由西北部自永宁州通平定州”，山西成为我国明清之际“西南西北交通枢纽”。^{〔1〕}在“田利本薄，农民终岁收入，纳赋应差，牛力籽种外，实无所馀，甚为赔累”的情况下，“民无恒业，多半携资出外贸易营生”，“其系种地为业，仅十之二三”。^{〔2〕}在人多地少，气候干燥的自然条件下，逐渐形成了重商轻农的社会习尚。如《太谷县志》卷三“风俗”中称：“阳邑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故耕读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土俗殷富，实由于此。”《五台新志》卷二“生计”亦称：“晋俗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于耕也。太原、汾州所称饶沃之数大县，及关北之忻州，皆服贾于京畿，三

江,两湖,岭表,东、西、北三口,致富皆在数千里或万里外,不资地力。”

陕西自然气候与山西近似,亦为我国西北交通要道所在。“西安为会城,地多骡、马、牛、羊、旃、裘、筋、骨,自昔多贾,西入陇蜀,东走齐鲁,往来交易,莫不得其所欲,至今西北贾多秦人,然皆聚于沂雍以东至河、华沃野千里间,而三原为最。若汉中、西川、巩、凤,犹为孔道,至凉、庆、甘、宁之墟,丰草平野,沙苇萧条,昔为边商之利途,今称边戍之绝塞矣。关中之地当九州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一,量其富厚,什居其二,间阎贫窶,甚于他省,而生理殷繁,则贾人所聚也。”^[3]《陕西通志》卷四十五《风俗》引《三原县志》称:“三原士勤学问,民多商贾。……至今士能敬业,城邑乡井类多弦诵,科目甲于诸邑,农勤力作,工不事淫巧,惟商贾远出,每数年不归。劝令买地耕种,多以为累。思欲转移,令务本轻末,其道良难。”陕西除三原重商轻农外,同州一带亦是商风很盛的地方。《同州府志》卷二十一“风俗”中亦称:“同州府南北阻山,东滨河,西涉坂,中亘沙苑,树而不田,故各属之地,高者碍于耕锄,低者祸于冲崩,穷民苦衣食之不给,富者皆弃本逐末,各以服贾起家……。”

山陕人民经商的历史记载很早。汉初,山陕人民与匈奴群众在长城脚下的边境关市上有了贸易往来。《汉书》载:“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使马邑(今山西朔州城之西北隅)人聂翁壹,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这是有史记载的第一个山西官商。盛唐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商路四通八达,山西商人在国内外交易中大显身手。武则天执政时闻喜人裴佑先“以财自雄,养客数百人,多调候朝事……累进工部尚书”。他利用职务之便,与边境邻国和部族进行互市贸易,“货殖五年,致资财数千万。”北宋雍熙至端拱(984—987)年间,宋王朝先后在山西境内的

岚州(今岚县)、火山军(今河曲)、唐隆镇(今偏关)、保德军(今保德)等地设立榷场(交易所),鼓励宋辽两地的商人进行商品交易。《宋史》卷二五五载:“张永德,并州阳曲人,家世饶财……。永德在太原,尝令亲吏贩茶规利,阑出徼外市羊。”元统一全国后,结束了南北对峙的局面,为国内外贸易的繁荣扫除了障碍。当时的太原、大同是黄河流域著名的商业都会。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由西北陆路来华,路经山西的平阳府、太原府。他在《马可波罗行记》中追叙太原、平阳的情况时说:“其中商业及数种工业颇见繁盛,有大商数人自此发足,前往印度等地经商谋利。”这是山西商人走出国门的最早记载。从上面记述中可以看出,山西人善经商是有悠久历史的。但在明代以前,山西商人尚未形成能影响全国经济的势力。这是因为,在宋之前,山陕一带的生态环境还不像后来那样恶化,植被和森林覆盖率较高,人口亦不太多。其次,当时的商品生产还比较落后,商品贸易还不甚发达。宋辽、宋金、宋元以及宋与西夏的许多争战均是在山陕和河北一带进行,战火不仅使这一带的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而且烧毁了这一带的许多林木。辽、金、元建都北京,明王朝后来迁都北京,京城屡建屡毁,要消耗大量的木材,这些木材大部分开采于太行山中的原始森林。元代之后山西人口急骤增加。明王朝建立后,为巩固北疆边防,采取的军屯政策,使山陕一带的许多牧场被开垦为耕地。森林和植被的减少,使土壤流失和沙化进一步加剧,气候干燥,降雨量减少,农业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在农业生产入不敷出的情况下,致使更多的人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

2. 兴盛的契机相同

徽州和山陕一带的人民经商的历史虽然很早,但形成影响全国经济的商人势力是在明代。明中叶,政府为筹集边防军饷而实行的“开中法”为山陕商人和徽商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机遇。明王

朝是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了蒙古族的统治后建立的政权。蒙古族失去中原后退居漠北,又过上了游牧生活,很快又恢复了昔日的生机。明王朝虽多次远征,企图彻底消灭蒙古势力,但总是事与愿违,蒙古铁骑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来越强悍,经常骚扰明朝的北方边境,并在正统十四年(1449)进攻明北部重镇大同,明英宗率军亲征,结果在土木堡大败,作了俘虏。明王朝为了抵御蒙古军队的南犯,从辽东至嘉峪关沿长城一线,驻守了数十万军队。为了解决边防部队的粮饷,明政府一方面让驻军屯田开荒,生产粮食,另一方面,以出让食盐的销售权为代价,鼓励商人将内地的粮食、草料、衣物、油棉等物资运往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偏关、延绥、宁夏、固原、甘州等边塞驻军重地。历史学家称这项政策为“开中法”。按照《正德会典》卷三六《盐法·事例》和《万历会典》卷三四《盐法通例》等文献记载,所谓开中法,就是商人把粮草、棉布等军需物资交送到指定的边仓后,边仓发给商人收到货物的证明即仓钞,商人持仓钞到指定的都转运盐运使司或盐课提举司换取盐引,即贩盐许可证,再持盐引到盐场领盐,然后把盐运到指定的地方销售。这一复杂过程需要一年至数年的时间,并要花费许多人力、物力,克服重重困难。山陕商人占有地理上的优势,且有丰富的经商经验和吃苦耐劳精神,故在开中法实施后纷涌而至。他们从内地以较低的价格购得粮草、棉布和其它日用品,运到边关,领取盐引后又到两淮、长芦、自流井、河东等地购得食盐,然后又到各地销售,赢利颇丰。

“开中法”的实施,为山陕商人的崛起,创造了机遇,也为徽商施展商才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徽商原本是以贩粮起家,从江浙贩运稻米到徽州,然后将徽州出产的木材、茶叶等贩运到外地。“开中法”实施以后,山陕商人发了大财,刺激了徽州商人。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一部分徽州商人挟资北上,开赴九边,与山陕商人争

夺商机。如歙县商人汪玄仪,曾“聚三月粮,客燕、代,遂起盐策”。^[4]休宁县盐商王全也曾“蒙故业,客燕、赵、齐、楚间”。^[5]徽商将内地生产的粮食等贩运到燕、代等北方边境,进一步扩大了他们的经营范围和活动地区,成为“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骛,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6]“足迹几半宇内”^[7]的一支商界劲旅。

3. 民风相似,勤俭致富

山陕和徽州的生活条件都比较艰苦,人民有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万历《歙志·序五》称徽州在“成、弘以前,民间椎髻少文、甘恬退、重土著、勤穡事、敦愿让、崇节俭”。民国《歙县志》卷一《风土》称当地“习尚俭朴,类能力衣服贾以裕其生。……民质重厚,耐劳苦,善积聚,妇女……不事修饰”。《歙事闲谭》第18册《歙风俗礼教考》中亦称当地群众“家居务为俭约,大富之家,日食不过一盂,贫者孟饭盘蔬而已”。勤俭节约为外出经商积累了必要的资金,同时也是徽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一个重要因素。山陕一带的人民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亦是此地商业能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明一统志》引太原府《旧志》称太原府的人民“善治生,多藏富”;《明一统志》引《绛州志》称平阳一带的人民“勤稼穡,好蓄积”;《清一统志》引《旧蒲州志》称蒲州一带“民性质朴,好节俭,力田绩纺,尤事商贾”;《清一统志》引《图书编》称潞安府“民俭务农”。勤奋节俭,不仅是山西人民的一种美德,而且成为旅居外地的山西人特别是山西商人战胜困难、成就事业的法宝。《宋文鉴》一三九穆修《徐文质墓志铭》中在提及居住在京师的外地人时说:“凡并人,其俗刚厚而勤啬,能节省以立衣食。诸来徙之户,初虽贫极者,居久而皆为富室。”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山陕商人,还是徽州商人,在他们原始积累阶段,生活起居都是比较节俭的,特别是创业者,即使发达以后,生活也比较俭朴。

但是当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巨富以后,特别是那些世袭豪商大贾的后代子孙,生活越来越奢侈、腐化,这成为徽商和西商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4. 均以儒家所提倡的诚信为商业道德,以义取利

孔子在《论语·学而》中要求他的弟子“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成功的徽商和西商都十分重视商业道德,把诚信作为做人和经商的信条。如徽商张洲,号东瀛,“俭约起家,挟资游禹航,以忠诚立质,长厚摄心,以礼接人,以义应事,故人乐与之游,而业日隆隆起也”。^[8]明嘉靖年间徽商李大皓“贾于云间、白下,又醖贾于皖城,又质贾于姑熟。传教于受承者曰:‘财自道生,利缘义取……’闻者洒服”。^[9]徽商休宁人黄梅原“言信情忠,游江湖间,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其规时合变,损盈益虚,巧而不贼,虽不矜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10]商业欺诈是与诚信对立的奸商行为,为一切诚信商人所不齿,如道光年间徽商舒遵刚“精确算,善权衡,年未三十即能创业。然与市阗狡诈之习不类。尝语人曰:‘圣人言,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又曰:‘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求生财者,自塞其源也。今之吝惜而不肯用财者,与夫奢侈而滥用财者,皆自竭其源也。人但知奢侈者之过,而不知吝惜者之为过,皆不明于源流之说也。圣人言,以义为利,又言见义不为无勇。则因义而用财,岂图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裕其源,即所谓大道也”。^[11]在徽商舒遵刚看来,以狡诈取财与吝惜、奢侈一样,是商人最容易沾染的恶习。狡诈只能侥幸于一时,从长远看,只能是自断其财源。所以,徽商吴南坡深有体会地说:“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12]徽商之所以能成为明清时期的一支商界劲旅,是与他们长期遵循了以诚待客、取信于民、不欺不诈、以义取利的商业道德分不开的。